

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保护与全民健身体系的同构

万 义, 胡建文, 白晋湘

(吉首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田野实地调查、历史比较等研究方法, 对湖南省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三月街”游神习俗与全民健身之间的关系等展开分析。结果表明: 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与全民健身的承载者均为民众, 以民间文化事象为主要活动内容, 核心在于传统的延续、创新和发展。民俗与全民健身体系的同构应注重对民俗“生活相”的整体保护, 注重将文化生态作为重点保护内容; 政府、学校和地方组织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 有利于民俗文化保护和全民健身体系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 少数民族地区; 白族; 民俗保护; 全民健身体系; 同构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98(2009)06-0025-05

Research on Iso-Structure of Protection of Folkways and Whole-nation Fitness System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Regions//WAN Yi, HU Jian-wen, BAI Jin-xiang

Abstract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field investigation, historic comparison etc., it made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arch Street” god tour folk custom and whole-nation fitness of Furongqiao Baizu county in Sangzi county Hu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rriers of both folkways and whole-nation fitness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regions are masses of the people and take folk cultural events as main activity contents, the core of which is the continuit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 The iso-structure of folk custom and whole nation fitness ought to lay stress on entire protection of “appearance in life” of folkways, pay attention to taking cultural ecology as the content to be emphatically protected, while the “three-in-one” innovation system of government, school and local is go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nation fitness system coordinated with the protection of folkways culture.

Key words minority nationality regions; Baizu; protection of folkways; whole-nation fitness system; Iso-structure

Author's address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Hunan, China

收稿日期: 2009-08-09; 修回日期: 2009-09-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07ATY003);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立项资助项目(0805057B)

第一作者简介: 万义(1977-), 白族, 男, 湖南张家界人, 吉首大学讲师; Tel: 13974350554 E-mail: wanyi2007@163.com

桑植白族是宋末元初从云南大理白族聚居区迁徙来的民族, 迄今已有 700 多年历史。《元史·兀良合台传》记载: 元军平定云南后, 于公元 1258 年“引兵入宋境”^[1], 途径湘西, 抵达长沙、武汉一带。后蛮赞军不再受重用, 就地遣散。桑植白族始祖谷均万、王朋凯、钟千一等被遣返过程中, “溯长江、渡洞庭、漫津澧、涉慈阳”^[2], 定居于如今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的 7 个白族乡, 即芙蓉桥白族乡、洪家关白族乡、马合口白族乡、刘家坪白族乡、淋溪河白族乡、走马坪白族乡和麦地坪白族乡。迁入白族虽然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 但仍然保留了民族特色十分浓郁的民俗文化和民间健身活动。

鉴于上述理论支持, 本文从民俗视角出发, 将湖南省张家界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为中心的 7 个白族乡确定为田野调查区域, 以白族“三月街”习俗作为重点考察内容, 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保护和全民健身体系一体化问题, 为民族宗教、文化教育、体育管理等政府部门制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政策和全民健身工作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1 芙蓉桥白族乡“三月街”游神仪式与文化解读

“千年赶一街, 一街赶千年”, 桑植迁入白族的“三月街”游神仪式是“三月街”习俗中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 可分为“请神”、“迎神”、“祭神”和“娱神”四个部分。

1.1 “请神”仪式的文化解读

“请神”仪式一般由白族当地“朵兮博”主持, 即白族的巫师。请神的地点在当地的本主庙中进行。本主庙正门前方供奉本主木雕神像: 桑植白族祖先中王朋凯脸膛红就塑成“红脸大公”, 钟千一脸黝黑就塑成“黑脸二公”, 谷均万脸白皙就塑成“白脸三公”, 统称为“大二三神”。本主神像前供奉猪头一个, 供品若干, 蜡烛一对, 香烛若干。请神时, “朵兮博”跪在神龛前, 手持点燃的上表奏文, 口念请神词请神。从桑植白族供奉的神像和请神的唱词来看, “请神”仪式是一种以祖先崇拜为主要特征的原始宗教活动, 祖先崇拜、英雄崇拜构成了“本主宗教”的崇拜核心。

1.2 “迎神”仪式的文化解读

迎神是游神活动的一项非常隆重的仪式, 由族长与执事班子具体安排迎神事宜。“迎神”礼炮三响后, 将本主木雕神像移入特制的彩轿, 由“朵兮博”在前领路, 其次紧跟数百人的迎神仪仗队, 依次包括唢呐锣鼓队、肃静回避牌、万民伞、日月龙凤旗、三槐堂牌位和大公王朋凯神像、知音堂牌位和二公钟千一神像、九经堂牌位和三公谷均万神像, 最后是舞龙狮、腰鼓舞、杖鼓舞、霸王鞭、打花棍队伍及其他余游神队伍等。一路鸣放鞭炮、吹着唢呐、敲锣打鼓、舞龙舞狮、耍霸王鞭, 热热闹闹地游巡本主管领的地域。沿途居民摆香案迎接, 点燃香烧纸钱, 跪拜

路祭。巡游完毕,将本主神像请回神龛安坐。

1.3 “祭神”仪式的文化解读

“祭神”仪式先由“朵兮博”诵经,白族宗族集体或个体家庭在本主神像前念祭文,焚化表文和神疏,跪拜祈祷,祭献供品等。以前祭献的供品多为猪肉、公鸡、鱼、蛋、“干那”(油炸彩色米粉薄片)、酒、茶等。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除了敬献三支香火之外,几乎不祭献供品。白族群众祭祀本主除了原有的怀念祖先、祭奠英雄的意义,还祈盼得到祖先神灵的庇佑,这种祭祀的心态反映出白族群众内心深处深刻的稻作文化特征。云南大理白族也派人前来拜祭,民俗文化活动成为两个不同地域民族认同的纽带。

1.4 “娱神”仪式的文化解读

娱神原意是为了使本主神快乐,以期感动神灵,得到神灵保佑,后来却演变为白族群众通过此种娱神活动获得自身的快乐和满足,所以“娱神”仪式又可称之为白族狂欢节。白天表演的主要有舞龙舞狮、腰鼓舞、杖鼓舞、霸王鞭、打花棍、摇旱船等游艺活动。晚上点燃四五丈高的大火把,圆周一丈余,上面遍插红、黄、绿等各色小纸旗,顶端扎一个三级彩色升斗,上书“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等吉祥如意的大字。白族群众围绕火把举行火把狂欢,边挥动火把、边唱白族情歌,刹那间,火把场变成了歌舞的海洋。据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记载:“城外万炬纵横,烂如星海,大夫登楼观之”^[3],反映了明代大理白族火把节的情景。桑植白族“三月街”娱神活动虽经历时间和地域的更替,但盛况依旧。

2 少数民族地区白族“三月街”习俗中的体育传承

2.1 图腾崇拜的嬗变与舞龙(图1)



图1 迎神活动中的白族舞龙

Figure 1. The Dragon Dance of Bai Nationality in the God Welcome Activities

图腾崇拜是人类与自然作斗争过程中,对许多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便把自然事物人格化,并赋予它超自然的力量,反过来再企求这种力量给自己以帮助,从而产生图腾崇拜的思想。《后汉书·西南夷传》曾记载:“(哀牢)以龙为图腾,……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4]。《白族文学史(增订本)》中也云:“白族特有的信仰‘本主’崇拜中,有许多‘本主’是龙王,当是古

代图腾遗迹的反映,而且是属于白族的了”^[5]。由此可见,桑植白族的舞龙是白族先民图腾崇拜嬗变的结果。白族龙由竹篾编制而成,一般长30 m,分红、黄两种。龙体以前用牛皮纸糊成,现在多改用当地自制的土布扎制。龙身用草绳和土布串联,龙须则用麻绳编制而成。在锣鼓和唢呐声中,身穿白族传统装束的人双手舞动扎有宝镜、响铃和大红绸花的龙珠引龙上场,舞龙手紧随龙珠的指引,做“龙戏水”、“龙翻身”、“龙上天”、“盘龙入海”、“二龙戏珠”等各种动作,如图1所示。

2.2 英雄崇拜的遗存与仗鼓舞

据《桑植县民家(白族)资料汇编》中记载:“1261年,忽必烈遣送‘寸台军’回云南。沿途少量逃兵来桑择居,仗鼓舞随之带入桑植……”^[6]。桑植白族仗鼓舞如今流行于桑植县马合口、麦地坪、梅家桥、三屋田、走马坪、人潮溪、冉家坪、余湖、长潭坪一带。目前健在的仗鼓舞艺人有钟以成、钟以善、谷兆庆、毛利之、钟千银等人。仗鼓舞艺人谷兆庆讲述仗鼓舞起源时说:“有一年的春节前,民家兄弟3人在家打糍粑,一小队官兵突然闯了进来,强行要把糍粑带走。兄弟3人眼看官兵要抢走糍粑,顺手就抄起打糍粑的杵棍打退了官兵。兄弟3人喜欢得手舞杵棍跳起来,以后逐渐形成一种舞蹈健身方式。”仗鼓似鼓形,两头大、中间小,两端鼓面用皮革绷衬。长1.2 m,鼓面直径0.15 m。仗鼓舞者踏着乐声节奏起舞,舞姿变化多样,有“么二三”、“三二一”、“三翻身”、“翻天鹰”、“兔望月”、“追天赶花”、“文王访贤”、“雷公扫殿”、“仙女献桃”等81套套路,其中不少动作就是由武术技击动作演变而来(图2)。



图2 娱神活动中白族仗鼓舞

Figure 2. The Drum Dance of Bai Nationality in the God Disporting Activities

2.3 民俗节日的变迁与霸王鞭

霸王鞭舞是“绕三灵”传统节日的重要祭祀内容。清代杨琯在其《滇中琐记》中以详细的笔墨记录了亲身感受到的大理“绕三灵”的盛况及白族“霸王鞭舞”的精彩场景:“大理有绕三灵会,每岁季春下浣,男妇坌集殆千万人,十百各为群,群各有巫觋领之。……霸王鞭者,以竹竿五尺,长等身,节凿孔三寸,置筒,嵌以二三铜钱,其孔参差相间,拍之则钱动摇,作款宣声。手握竿之中而拍其上下截。拍手承以臂,拍足承以踵,拍头承

以颈、拍腰承以股, 俯仰屈伸, 辗转反侧, 无不中节, 亦绝技也”^[7]。现在桑植白族霸王鞭不仅出现在传统民俗节日中, 也出现在民间贸易表演和群众健身等活动中, 已经演变成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舞蹈健身方式。舞者手持霸王鞭, 在跳跃、旋转、跪蹲、站立等舞姿中, 上下左右翻飞, 并以棍击掌、肘、肩、头、腿、胯等部位, 或击地、或与他人互击。其间还伴有“背对背”、“心对心”、“脚勾脚”、“凤穿花”、“对开花”、“五梅花”、“一条街”、“龙吐水”等竞技和舞蹈动作, 动作有36种之多, 是强身健体和增添欢乐气氛的群众性娱乐健身活动(图3)。



图3 迎神活动中的白族霸王鞭

Figure 3. The Whip Dance of Bai Nationality in the God Welcome Activities

2.4 崇武尚勇的精神与打花棍

“打花棍”, 又称“打莲湘”, 是深受桑植白族劳动人民喜爱的动作性很强的歌唱和舞蹈形式。清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成书的《帝京岁时纪胜》就曾提到了当时有“打花棍”的活动^[8]。桑植白族自云南大理迁徙而来, 为了能在土家族、苗族、汉族地区中生存、繁衍和发展, 十分注重崇武尚勇和德才兼备的教化。《武陵谷姓白族志》中就有“始来与溪蛮峒苗错居, 非联同种不足捍御外侮”、“君子化民成俗, 其必又学”等记载^[9]。土生土长的桑植白族打花棍艺人都从小学过武术, 也酷爱民间表演艺术, 他们将武术技击动作融入打花棍活动, 武术技击动作在打花棍的表演过程中明显占据很大的比重。花棍为木质, 长约1—1.5 m, 直径4 cm, 两端有铜铃或系有红绸。打花棍表演形式有“单人花棍”、“双人花棍”、“集体花棍”等形式, 有“白鹤亮翅”、“锦鸡展翅”、“二郎担山”、“妹妹相会”、“雪花盖顶”、“鹞子翻身”、“嫦娥奔月”、“彩龙缠腰”等棍法的技击动作, 对白族武术功法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图4)。

3 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保护与全民健身体系同构的理论依据

3.1 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与全民健身的承载者均为民众

民俗是在广大民众中传承的社会文化传统, 是被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这种社会文化既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 也是民众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英国民俗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考古学家汤姆斯(W·J·Thoms)早在1978年就提出民俗的本意是指“民众的知识”, “民间的智慧”或“关

于民众知识的科学”^[11]。《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作为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纲领性文件, 也提出了“积极开展少数民族体育, 在民族地区广泛开展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主的体育健身活动”的指导性意见^[12]。所以, 少数民族地区民俗和全民健身的承载者均为民众, 民众是民俗和全民健身活动开展创造者, 也将是民俗和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直接受益者, 民众在民俗和全民健身活动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主体性作用。



图4 娱神活动中白族打花棍

Figure 4. The Huagun Dance of Bai Nationality in the God Disporting Activities

3.2 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与全民健身均传承着民间文化事象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活动来说, 它是一种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禁忌, 是共同参与的仪典和狂欢, 既是社群共同面对自然循环变化规律的群体反应, 也是个体的生命流程变化的富有节律的群体反应。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活动是由历史长河筛选出的, 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民间文化事象的集合体, 是民众创造、延续、创新和发展的特定民族文化现象。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必须和当地的宗教信仰、族群习惯法、民族心理认同、民俗文化紧密结合。“挖掘和整理我国传统体育医疗、保健、康复等方面的宝贵遗产, 发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 “推广简便易行和适合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特点与体质状况的体育健身、方法”^[12]。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 如果能与民间文化事象紧密结合起来, 必然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时代感、现代感、新的民间文化事象。

3.3 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与全民健身发展的核心均在于传统

民俗传统是一种世代相承的文化, 既是体现和反映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特殊人类群体的重要标志之一, 也是组成这个民族的传统性文化某些特征的根本所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许多学者认为的传统往往带着狭义性, 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传统是“文化遗留”, 是仍然存在于后世当今社会中的一系列原始文化遗迹, 如仪式、习俗、信仰和观念, 是一种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文化现象, 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13]。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活动不管是由群体或个人所创造, 传承发展的内在因素都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革新, 其内涵都侧重于某个民族观念意识上的精髓, 带有鲜明的传统性特征。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民俗文化的发展就是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基础上的一种螺旋上升的变迁历程。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与全民健身发展的核心都在于传统,均在于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基础上的一种螺旋上升的创造和革新。

4 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保护与全民健身体系的同构

4.1 生活相——同构的主体对象

民俗文化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母体和精神内核,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则是民俗活动的载体和内容,二者相互依存,共同繁荣和发展。从生活层面上理解,形形色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包括使用的器具、活动的规则、参与的人群、文化的模式都是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技艺和生活习惯,是一种伴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经济变革、文化变迁的“生活相”,所以我们应该注重对“生活相”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生活相”还是一个民俗思想文化的源头,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形态进行追根溯源,才能深刻了解一个民族的灿烂文化和精神内涵,才有利于全民健身工作的开展。

4.2 文化生态——同构的重要内容

“文化生态”的理念,其目的在于“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14]。各个民族由于该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建立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异性,形成了各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为各少数民族形成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奠定了基础和条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和当地的宗教信仰、族群习惯法、民族心理认同、民俗文化传播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保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不是从文化生态的整体入手,而是仅仅保护体育活动的过程,保护最后只剩下没有灵魂的躯壳。因此,我们应将民俗活动作为全民健身体系的重要形态,将文化生态保护作为民俗保护的重要内容,最终形成活态的保护体系。

4.3 动态平衡——同构的运行机制

保护不等于守旧,创新发展才是民俗文化发展的源泉,也是全民健身体系必须遵循的原则。事实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伴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转型,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如:现代工艺制作的白族仗鼓、霸王鞭、龙灯等相比传统的工艺更加精致,表演过程中借助现代打击乐器、灯光、音响设备在芙蓉桥乡也屡见不鲜,群众参与传统体育活动受宗教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体验参与其中的快乐和满足。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保护与全民健身体系同构的运行机制要满足一种动态平衡,在保持本民族文化优秀特质的基础上,能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分,甚至国外现代技术的优秀成果,真正做到保持传统和创新发展的动态平衡,为民俗文化保护和全民健身的普及构建一个发展平台。

4.4 一体化——同构的创新体系

“一体化”指政府、学校和地方组织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民俗文化和传统体育的地方自我组织体系具有组织灵活、方便易行等优点,但也存在容易丧失自我反省、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功能等弊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加强政府组织和自我组织之间的协调,对民俗文化和传统体育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桑植白族的仗鼓舞和游神活动也已列入湖南省第二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成为当地群众和各地游客参与性、观赏性极高的民俗活动就是典型的案例。此外,学校是民俗文化和传统全民健身体系的有效载体,加强中小学生学习民俗文化和传统体育知识的学习,对少数民族地区民俗的保护与全民健身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民俗保护与全民健身体系同构需要政府、学校和地方组织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民俗文化和传统体育在这种创新体系中自我调节、自我更新,通过渐变与突变交织着的延续,最终形成自主性的变革和更高实现。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民俗活动中通常未形成独立的文化形态,而是作为民俗活动载体和内容存在,与当地的宗教信仰、族群的习惯法、民族心理的认同、民俗文化的传播等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民俗文化则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母体和精神内核。

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与全民健身的承载者都为民众,民众是民俗和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创造者,也将是民俗和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直接受益者。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与全民健身都是以民间文化事象为主要活动内容,核心都在于传统的延续、创新和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保护与全民健身体系同构应注重对民俗“生活相”的整体保护,将文化生态作为重点保护内容。保护不等于守旧,政府、学校和地方组织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有利于民俗文化保护和全民健身体系协同发展的动态平衡。

5.2 建议

民俗和全民健身活动要突出民族特色,展现民族风情。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在民俗和全民健身活动中突出活动的民族性、独特性、新颖性成为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只有具备民族特色、展现民族风情的民俗文化和健身活动才能保存永久的魅力。民俗保护和全民健身体系的紧密结合,是展现当地民俗文化和突出群众健身实效的有效途径。

民俗和全民健身活动要简单易行,增强群众参与性。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传统体育活动,如摆手舞、踩高跷、打陀螺、踢毽子、打飞棒、九子鞭等动作比较简单、技术难度不大,民众都可以广泛地接受和参与。参与活动的民众只有在轻松的活动氛围中激发了参与的兴趣,领略了传统体育深刻的文化内涵,才能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民俗文化和健身活动中。

民俗和全民健身活动的发展之路要走向社会化、企业化。既要使民俗和全民健身活动办出特色,又要减轻投资负担,民俗和全民健身活动可走向社会化、企业化。在政府科学思想方法的指导监控之下,接受企业投资承办,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方式处理,既能减轻政府负担,也为企业树立自己良好形象创造了条件。

民俗和全民健身活动要完善民主与法制建设。只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完善才能为群众参与民俗和全民健身活动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参与性和创造性,不断为民俗和全民健身活动的创新注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也为民俗保护和全民健身体系的完善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 [1] 段鼎周. 白子国探源[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8: 256
- [2] 桑植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桑植县志[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0: 511
- [3] 刘文征. 滇志[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1: 137
- [4] 武文. 中国民俗学古典文献辑论[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267
- [5] 张文勋. 白族文学史(修订本)[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3: 30—31
- [6] 谷臣章, 谷忠诚. 桑植县民家人资料[Z]. 桑植: 桑植县印刷厂, 1983: 116
- [7] 石裕祖. 云南民族舞蹈史[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280—285
- [8] 上海杂技团. 中国杂技艺术[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206
- [9] 武陵谷姓白族志编纂委员会. 武陵谷姓白族志[Z]. 桑植: 桑植帅乡彩印厂, 2001: 3 183
- [10] 叶涛. 中国民俗[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2
- [11] 黄金钰. 中国民俗研究八十年[J]. 甘肃社会科学, 1999(6): 47—50
- [12] 国务院.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C]//伍绍祖.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9: 571—572
- [13] 高丙中. 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 文艺研究, 2008(2): 77—88
- [14] 唐家路. 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31—32

(上接第5页)

- [3] 陈山. 中国武侠史[M]. 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2: 13
- [4] 刘大先. 孤傲之剑与忠诚之刀——中国侠士同日本武士的文化比较[J]. 克山师专学报, 2002(2): 38—41
- [5] 林伯原. 中国近代前期武术家向城市的移动以及对武术流派分化的影响[J]. 体育文史, 1996(3): 14—18
- [6]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史[M]. 北京: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 137, 142
- [7]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 中国武术史[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7: 365
- [8] 杨建营, 邱丕相. 武术的文化进程探析[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8, 32(2): 47—50
- [9] 戴国斌. 武术现代性的断裂[J]. 体育文化导刊, 2004(2): 35—38

(上接第10页)

- [12] 周金伙. 福建少林狗拳(上)[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9—10
- [13] 康戈武. 中国武术实用大全[M].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0: 215, 219
- [14] 向恺然. 拳术传新录[J]. 国术统一月刊, 1947, 1(3): 7
- [15] 平江不肖生. 侠义英雄传(上)[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4: 140—141, 149—159
- [16] [法] 克洛德斯·特劳斯. 神话学: 生食和熟食[M]. 周昌忠,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17
- [17] 余英时. 东汉生死观[M]. 侯旭东,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23—46
- [18] 戴国斌. 武术的文化生产[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50—67
- [19] 李大钊.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J]. 言治, 1918(3): 3
- [20] 陈利华. 舞物狮小考[J]. 文史杂志, 2001(1): 52—53
- [21] 赵长松. 四川狮灯[C]//张紫晨. 民俗调查与研究.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229—243
- [22] 编者按. 强大神圣 富于威力: 外国人看“中国龙”[EB/OL]. [2006—12—14]. <http://culture.wx216.com/whby/wk/36555.html>
- [23] 方彪. 镖行述史[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1995: 94
- [24] 杨澄甫. 太极拳使用法[C]//李天骥. 武当绝技——秘本珍本汇编. 长春: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276
- [25] 阿尔方索·林吉斯. 尼采与动物[C]//汪民安. 生产(第3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9
- [26] 托马斯·马乔. 动物[C]//汪民安. 生产(第3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90
- [27] 吕克·肥礼. 既非人亦非顽石[C]//汪民安. 生产(第3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66
- [28] [法] 茨维坦·托多罗夫. 象征理论[M]. 王国卿,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149
- [29] 吉尔·马斯登. 巴塔耶与动物性的诗意化误置[C]//汪民安. 生产(第3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41
- [30] 黎焕勤. 以语言学角度试探汉字在文字设计之影响[EB/OL]. [2006—10—15]. <http://www.kyu.edu.tw/93/epaperv6/93-245.pdf>